

第七辑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二年 8—11辑

开始续订和扩大发行的通知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以来，受到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工矿企业和史学研究部门所重视，纷纷来信订阅。原来本选辑发行到县（市）一级，嗣经研究决定，扩大发行到公社一级，以满足各地干部、教师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本选辑决定在1982年度继续编印出版第八辑至第十一辑。每辑的刊期暂不固定，但保证全年出齐四辑。内容仍以我省的近现代史、革命史为主，着重采集革命老干部和各方面老人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自五四运动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为止，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我省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史料。

原有订户需要续订者，请来函联系。份数如有增减亦请说明。

新订户可自第八辑开始。第一辑至第七辑尚有少量存书，需要者可优先供应。

一九八二年度出版的8—11辑，每辑收费0.70元，四辑共2.80元，补订1—2两辑的共收费0.80元。3—7辑每辑0.70元，共收费3.50元。

来信请寄江西南昌市中山堂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汇款银行帐号：南昌市人民银行胜利路办事处7088017（省政协）。

江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1981年12月

目 录

宁都起义始末	宁都县政协文史组、宁都县博物馆 (1)
朱军长攻克宁都城	曾庆圭整理 (41)
“此是东井冈”	钟 平 (53)
回忆汀、瑞地区三年游击战争	邓海山 (68)
我所知道的汀、瑞地区游击队片断	黄长娇 (74)
大柏地战斗	甘为牛整理 (77)
辛亥海军起义发动者何渭生简介	刘崇英 (80)
江西畬族略史	贵溪文化馆周沐照 (84)
杜重远与景德镇瓷业	本刊记者 (107)
《景德镇史话》御窑厂	刘重华 (120)
《景德镇史话》师主庙和风火仙	黄席珍、刘重华 (122)
《景德镇史话》五府十八帮	刘重华 (125)
《景德镇史话》珠山八友	毕渊明 (127)
解放前南昌市钱庄概况	彭寿山 (131)
国民党统治时期景德镇钱业内幕	俞昌鼎 (138)
旧社会乐平的当铺与租老婆恶习	黄存厚 (146)
痛诉长城抗战的失土辱国	韩梅村 (150)
鹰潭的过去与现在	潘纯整理 (162)
江西大汉奸肖淑宇之死	伏化夫 (172)

宁都起义始末

宁都县政协文史组、宁都县博物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江西省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就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促进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形势，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直接的、有力的支援，同时，还为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与兵运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曾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一、起义军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正当北伐军进抵武汉，冯玉祥偕同于右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刘伯坚、乌斯曼诺夫（苏联将军）等一行从苏联回国，到达绥远省的五原。旋即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亲任总司令。九月十七日，在五原的大校场誓师，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发表著名的《冯玉祥五原誓师的宣言》，响应北伐。并决心对部队进行改组、整顿，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军事顾问。

刘伯坚同志为把冯玉祥这支军阀军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根据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全军，设立总政治部，军、师、旅、团、营，也都设立相应的政治工作机构。

为了充实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同志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李大钊同志输送政治干部。后来，南方局、上海局（即中央局）及黄埔军校，都先后给西北军输送了总计数百名干部，其中，最知名的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即刘志丹）、魏野畴、蒋昕松、方廷桢（即方仲如）、刘晓渊、安子文、曾晓、贾舞（又名贾丽南）、李联珍等同志。他们大都担任了军、师一级政治部的负责人，奠定了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基础，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传播。从此，西北军有了较明确的政治方向，全军上下，生机勃勃，使旧军队的恶习有所克服，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受到西北人民的拥戴。

其次，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刘伯坚同志又在包头、银川、西安等地创办了多期军官学校（又称军事政治干校），为西北军培养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军事干部。军政学校亦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如王一飞、唐澍、贾大容等同志都在其中工作过；邓小平（当时名邓希贤）同志亦于一九二七年在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每办一期军政学校，刘伯坚同志都亲自到校上课，并特别注重在学员中发现骨干、培养人材，发展党组织。刘伯坚同志知识渊博，对马列主义造诣很深，加之用语生动，比喻形象，使来自下层军官或士兵的学员极易接受，效果很好。

再次，每逢部队举行重大集会，刘伯坚同志总要到会演讲。为了唤起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还广泛开展地方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其它各种群众组织，在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另外，刘伯坚同志在自己主管西北军政治工作后，还将西北军总部机关报《西包头报》改名为《中山日报》，派共产党贾舞担任该报社社长，郭伯瑞、胡英江任编辑，刘景熙（现名刘贯一）、贾一中（原名李子光）任记者，使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西北广大地区的重要喉舌，对西北军和西北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起

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对其广大官兵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西北军将领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后来的进步，以至发展成为坚决的革命者，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五原誓师”以后，为了在军事上配合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国民军联军遂经宁夏进入甘肃，并电令甘肃代理督办刘郁芬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经平凉东下，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迫使围攻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北洋军阀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撤围于这年年底进驻西安。翌年春，采纳刘伯坚和乌斯曼诺夫为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伐而提出的“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战略方针，于五月，分兵两路向中原挺进，并于同年六月一日在郑州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唐生智部胜利会师。

正当大革命处于高潮之际，窃踞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支持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此导致中国南部出现宁（南京）汉（武汉）纷争的局面。“马日事变”后，六月十日，冯玉祥竟与从武汉来的汪精卫、孙科等人举行所谓郑州会议，决定唐生智部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举行了所谓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并致电武汉汪精卫，推动他们也走上叛变的道路。从此，蒋冯联合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使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中途夭折。

蒋冯合流后，冯即在西北军中进行“清党”反共，撤销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的职务，并将共产党人师以上的政治工作人员集体遣送至武汉；将苏联顾问遣送回国；同时命令各地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国民军联军中革命空气遽然消散，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暂时统一。但在蒋

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李宗仁联合战胜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久，又趋于破裂，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爆发了蒋冯战争。这次战争历时一个来月，以国民军联军失利告终。国民军联军遂由河南等地退回陕西。

蒋、冯战后，西北、西南的军阀和国民党的反蒋政派，又迅速形成反蒋大联合。冯阎桂三个集团，倾其全力反蒋，从四月起，展开空前的军阀大混战。打到九月，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发出通电拥蒋，大举入关，突然抄了反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缩回山西。攻入湖南的桂军退回广西。总兵力达二十六万余众的冯玉祥部，至此亦土崩瓦解。冯玉祥被迫下野，残部交由鹿钟麟。鹿钟麟无法收拾残局，又交给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这时在新乡，将所有退回来的残部集中黄河以北焦作一带，计收容了高树勋第十二师，董振堂第十三师、李松昆第十五师、季振同第十四师和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共约三万余人，投降了蒋介石。

孙连仲投蒋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任孙连仲为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以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分充旅长；高树勋任二十七师师长，由池峰城、王恩布、施积枢分充旅长。所部均按一师三旅、一旅二团，每师附以炮、工、辎、通讯各一营编制。另外，将张华棠、祝常德两个骑兵旅合编为骑兵第四师，以关树人为师长。不久，孙连仲获悉经过西安起义失败后的第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赵博生，正在郑州吉鸿昌处闲住，于是把他邀请到济宁来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其他旧部也陆续被蒋介石改编。

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达到分化、削弱以至消灭冯玉祥旧部力量的目的，施展“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伎俩，分批“邀请”孙连仲部将领到南京“传见”，设宴招待，并给每人赠与甚厚；蒋介石还和南京高级文武官员到浦口“礼迎”孙连仲进

京，当面委任孙连仲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江西清乡督办，升高树勋为上将军长兼二十七师师长；下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所有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和胡祖玉的第五师统归孙连仲指挥，并答应二十六路军增加军饷，补充装备……，将孙连仲部调离山东，开入江西攻打红军。孙连仲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率部二万余人，从山东济宁，经浦口开往江西，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反革命围剿。

二、重投内战进维谷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同年二月纠集二十万兵力，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军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对于敌人必将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等同志是早已意料到的。第一次“围剿”结束，即在宁都县的小布、黄陂等地领导军民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准备。

就在红军总部下达命令，将各分散发动群众的红军主力，脱离与敌接触，迅速向根据地内的石城、广昌和瑞金北部、宁都南部、兴国东部及永丰的藤田等地区转移集结，继续筹措给养并加强进行战前直接准备的时候，孙连仲于三月下旬亲率二十五师进至宜黄，高树勋带二十七师夺占乐安。准备分路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东韶、小布、黄陂等处发动进攻。

当时，根据地前沿各处及游击区域的人民群众，为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立即进行“坚壁清野”；地方武装和少先队，开展以“十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为内容的游击战，迟滞、疲惫、消耗敌人。二十六路军不习惯于山地行军作战。那时，江西公路很少，行军困难，孙连仲部队还没有踏进根据地的门，见到红军的影子，即

被这未曾见过的战术搞得蒙头转向，疲劳沮丧，日夜不安。

五月中旬，高树勋二十七师进到乐安南部与永丰、宁都两县接壤地带。接着，王恩布率其第八十旅经大金竹进向中村；师部率池峰城第七十九旅、施积枢第八十一旅经荫水至东韶。同时，孙连仲率第二十五师由宜黄经河口、黄陂、新丰于五月十七日到达洛口。南方的五月，正值梅雨，这一带都是山区，路窄崎岖、泥泞，有些用石块铺成的古老地段，也因年久失修，或被游击队为了“堵敌”而破坏，步兵行走艰难，炮兵驮马必须卸载人抬，而且不时受到地方武装神出鬼没的截击、袭扰；在密林深谷中，又时闻“穷人不打穷人”等口号声，派兵去追击、搜索，一无所见，四十华里的行程，一旅部队自凌晨出发，至夜半才到齐宿营，实在疲乏不堪。到了洛口，孙连仲得知红军主力在西，遂折转向西，拟将两师集中于南团，再出击小布，向红军的侧翼进攻。

其实，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早已离开小布、黄陂，于四月下旬初，率全方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根据地的前部东固地区等待了三十五天之久。五月十六至十八日，红军在白云山、富田等地一举歼灭了敌公秉藩、王金钰两师乘胜追击，于十九日在白沙歼灭了郭华宗师大部。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石马附近的尧坊，于午后七时五十分下令红军攻击敌二十六路军高树勋部。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任左翼，沿地盘源、丁家岭、西源垅三路攻击中村之东北端；红四军任右翼，沿四十九垅向焦坑、罗华山、牛坑之线向中村南端攻击；红三军、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尾随并策应红四军，实施围歼。

敌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七师师部和七十九、八十一旅原在东韶，于二十日开向南团。在距小布约四十华里的途中，高树勋得意地对副师长赵大璞说：“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可是，师部刚抵南团，忽然接到南昌行营电报，说红军现正向郝梦龄师进攻，望速增援郝师。高树勋一看发报时间，过去了几个钟头，

郝师目前的位置、情况不明，只知头天进到沙溪、约溪。看地图发现该两处及其附近地形都不利于防守。因此，判断郝师如未被歼，就很可能退到了藤田。决定第二天再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遂令由大金竹向中村前进的王恩布旅前进几里，将中村让给师部。当师部行抵坳子岭时，突接王恩布的紧急报告，说前进数里即遇到红军的袭击，团长王广田和营长一人阵亡，情势危急，请速援助。此时，高树勋等即令随师部先到的池峰城七十九旅展开，夺占要地，准备应战；自己则企图赶到前面去指挥作战。但因路窄，只能单人通行，距中村仅十华里的路，用了三个小时才赶到。中村，位于永丰县东南部与乐安、宁都两县交界处的一条南北窄、东西长的山谷中。实际上，王旅当时所遇的还仅仅是红军一部的前哨。

战斗在二十二日上午正式打响。红军不断从正面及北翼向王恩布旅增加兵力，使敌师部的北翼和后方遭受重大威胁。下午四时，主攻的红军向敌冲击，战至入夜，敌军不支，不断向总部告急。半夜时分，敌师部接到孙连仲来电，施积枢八十一旅已随总部向东陂东撤，令二十七师马上撤退。敌师部当即命令第七十九旅第二团掩护两旅的特种部队（非战斗勤杂部队）先撤，翌晨敌主力一部经大金竹向乐安，另一部经坳子岭、南团、东韶、肖田向宜黄撤退。敌七十九旅特种部队在向大金竹撤退途中，被红军截击全歼，步兵一部突围冲出，折回向东撤退，把仅有的一条小路堵死，挡住了由阵地后撤部队的退路，乱作一团，盲目乱跑，谁也指挥不了谁。高树勋目睹此景，顾不上备马，即出村上山逃去。正当敌军绕道爬山，红军从西山直冲而来，直抵中村山谷将敌师部的掩护部队及来不及溃逃的官兵，全数歼灭，侥幸撤出的各路溃兵，又遭到了根据地地方武装的伏击追歼。此战，敌二十七师损兵一整旅，机步枪三千多枝和一驾无线电台。

高树勋等逃脱红军追击后，第二天到达宜黄东陂，吃了败仗不愿与总指挥孙连仲见面，派副师长赵大璞去报告失败经过。孙

连仲受到蒋介石的“宠拔”后，一直神魂颠倒，到达南昌时，何应钦、鲁涤平以次数千人到车站隆重欢迎，更使他自命不凡。但所部二十七师刚与红军交战，便遭惨败，亦心神不安，因令二十七师随总部向宜黄撤退，令二十五旅李松昆部从新丰向河口后撤。

红军在中村获胜后，继续向东横扫，使广昌之敌处于危境，敌南昌行营便电令二十六路军向广昌增援。他们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前往，也向宜黄撤退。孙连仲在宜黄召集官佐开会，商讨如何报告失败和未向广昌增援，擅撤宜黄的责任问题。他们忧心忡忡，想不出推卸责任的正当理由。最后，赵大璞提出捏造假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抬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孙连仲听后大喜，即叫参谋长据以上报，并派赵大璞于次晨前往南昌，面报作战经过。其他旅、团以下官兵，虽已撤出，但回顾在中村失败的情景，无不胆战心惊，甚至晚上，看见老百姓照泥鳅的火把，也以为是游击队。

继中村战斗胜利后，红军又连克广昌、建宁两县城，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时隔一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还请了法、日、美人当顾问，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率领下，从福建建宁等地出发，绕道千里，回到兴国集中，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于八月上、中旬，先后在兴国莲塘、良村和宁都黄陂，接连与敌三战三胜，缴枪逾万。接着，红军又象捉迷藏似的与敌人兜圈子，把它拖得精疲力竭，迫使蒋介石全线撤退。趁敌军溃退之机，红军又消灭他一个师和一个旅。从而，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在这次“围剿”战役中，二十六路军被划归敌右路集团军，

由乐安、宜黄出发，进占宁都。虽没有受到红军的打击，却陷入进退维谷之中。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令其它各军后撤，独二十六路军例外。如不消灭共军，不许离开宁都，而且在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摆上嫡系朱绍良部堵其后路。

当时的实际情况很不利于二十六路军驻守宁都。一方面，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百五十万，红军的主要任务转为协同地方武装打“土围子”，拔除根据地内的白点；另一方面，宁都县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较早，有很好的群众条件：一九三〇年冬，全县就有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地方革命武装，而且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在几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党和军事领导机关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都曾在宁都境内领导军民开展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而且在东韶、黄陂直接指挥军民进行了反“围剿”战斗。即使在二十六路军长驻宁都城的情况下，周围一、二十里之外都属红色区域；二十六路军摆了一个团在石上地区，维护通往广昌、宜黄的狭窄交通线，都时常受到当地地方武装的袭扰和截击，很不安宁。二十六路军处于红色区域包围之中，陷入了前进将被红军歼灭，后退又为蒋介石所不容的窘境。

二十六路军的士兵以及相当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本来不愿意到江西来的。还在离开济宁向南开拔时，便有一个团在孙氏店车站跳下火车，破坏铁路、车辆，拒绝开差。部队勉强来到江西后，在宜黄、乐安“驻剿”的一段时间，饱尝了种种艰苦滋味，中村败阵后，广大官兵不但认识到到江西来受了骗，而且产生了一怕红军、二怕下雨（江南的春夏，往往阴雨绵延数十天之久）、三怕吃大米（他们来自北方，习惯面食）的思想。进到宁都后，又增添了怕生病、怕死在宁都喂狗。

当时，北方人初到南方，不但水土不服，而且天气炎热，不准农民进城倒马桶、运粪便，以至街头巷尾到处粪便充斥，蚊蝇

极多，疾病流行，特别是恶性疟疾和暴发性痢疾最多。全年无病的人仅百分之几，每天都要抬出数十具尸体到郊外掩埋。不到三个月，城西北郊荒山上便挤满了一冢一冢的新坟。因病死亡的数以千计。白天黑夜都有饿狗，在乱坟堆中争相咬臭尸腐肉。目睹此种景状，二十六路军的官兵无不心寒胆颤。有的伤心地说：“今天我埋你，我死了谁埋我？迟早要到那乱坟岗去报到、喂狗！”

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视为“杂牌军”，在政治、经济待遇和军事装备上，十分苛刻，经常一连两三个月没有饷发。即使发饷也要七折八扣，将官只能得到百分之四十五，校官百分之六十五，士兵百分之七十。士兵的百分之七十还不能全部到手。一个一等兵，全饷每月十一元，实际应发七元三角五分，但除去伙食三至四元，发到他们手的，不过三角五分。其余的三至四元，统统被军官克扣贪污去了。由于士兵薪饷无保障，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天天喝稀粥、吃空心菜越吃越拉，这也是疾疫蔓延，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不少军官为了吃空额，竟把没有断气的士兵，也抬出去埋葬。坟里时常发生呻吟呼救声。

在二十六路军里，官长虐待士兵，习以为常。一次，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一个列兵会操时，连长楚新亚见他动作迟钝，横施体罚，作践得卧病不起。不久，团长李锦亭又将他拉出，在全团申斥、体罚，结果，不几天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

在二十六路军的士兵中，有些是为了养活父母妻儿才当兵的，也有强拉硬绑来当兵的。父母妻儿在盼望他们早日回去，他们也惦记亲人是否饿死，都想开小差逃回家去。可是，蒋介石早有命令，谁要擅自通过广昌，一律枪毙。有个士兵因逃跑，被抓回队，团长即集合全团官兵，当众打得血肉模糊，说：“往后，谁开小差谁就是这种下场！”

总之，这一切都反映了二十六路军中官兵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且，处境越艰难，矛盾越激化。在贪污薪饷上，还存在着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士兵的现象；在争夺权势上，还存在着西北军时

代靠枪杆子升上来的“行伍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出来的“士官生派”，从西北军将校团结业来的“将校团派”和在军官学校毕业出来的“军官学生派”，他们之间互相嫉妒、争权夺利。而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矛盾的焦点，则是集中在孙连仲、蒋介石的头上。骂孙连仲是“孙肉头”（靠“喝兵血”长得肠肥脑胖象个肉头）；骂蒋介石是“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官兵，眼见日寇肆无忌惮地吞噬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全国抗日怨潮的推动下，满腔国破家亡的义愤，感到作为中国军人，有义务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受侵犯。许多连队纷纷写下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逼迫各级军官逐级上送，最后联名敦促总指挥孙连仲电呈蒋介石。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也很想把部队拉回北方，认为抵抗日寇入侵，理直气壮，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说明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希望批准。没等蒋介石复电，就命令全军撤离宁都，向北开拔。走到宁都以北六十多里的胡岭嘴，蒋介石的电报来了，除对孙连仲大加训斥，并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原防外，还令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部在广昌的头陂一带进行阻挡。孙连仲无奈，只好开回宁都。

二十六路军这种正义的爱国行动遭到遏止后，全军上下，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更加痛恨。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孙本人借口牙痛，把全军军务交给总参谋长赵博生主持，把兼任的二十五师师长一职，提升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担任，另调总指挥部参议张芳昭任旅长，自己离开宁都治牙去了；接着，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也声称身体不好，前往南昌养病；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八十旅旅长王恩布也借口招兵，离开了宁都。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则以省亲为名，请假回了老家（有人说是外出寻找党组织）。留下的官兵，更加陷入消极、彷徨、绝望之中。

三、秘密建党开展兵运

大革命的失败，对我们党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便是加强兵运，从根本上改变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扩大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瓦解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兵运工作是要靠党组织去开展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二十六路军的前身国民军联军中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除过去未曾暴露身份的党员外，均被“清洗”。潜伏下来的少数党员，也大都失去了组织联系。该部被收编以后，只有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同志才与河南军委的一个组织接上了关系。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路军被驱开向江西，到达浦口时，原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汉澄（现名袁血卒），打进了七十三旅二团三营，改名袁零，补了个上士的名字，于三月随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后，在黄陂圩见到了相识的刘振亚，彼此接上了关系。刘振亚原以为到了江西“围剿”红军的地方，只要去找到红军或苏区党的组织，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可以接上关系，不知道要进入苏区，没有红军机关或苏维埃政府的证明，是不行的。因此，他对袁汉澄说：“你来得正好。是不是你回到开封去，找他们想办法打通关系？”袁汉澄当即答应。刘振亚给了他路费，告诉他接头的关系是“河南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陈立”。

袁汉澄到开封接上关系后的第二天，又遇上了过去同在西北军官学校学习的王超同志从归德（即商丘）来了。袁汉澄向陈立、王超介绍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他们又向河南省军区负责人方纪纲同志介绍袁汉澄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并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到河南潢川吉鸿昌的部队去；一是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方纪纲说：“从全国范围考虑，我们的工作重点在江西。蒋介石把新编的二十六路军匆忙地开赴江西‘剿赤’前线，我们的工作也应该赶上去。你们是留在河南好，还是去江西好？要请中央决定，你们暂等几天。”这时，袁汉澄经请示陈立同意，给过去军官学

校的同学、一同从山东济宁开小差的李肃写去了一封信。两天以后，方纪纲通知王超、袁汉澄到江西去。并叫他们先到上海（党中央）去一趟。

袁汉澄和王超一道前往上海，到达徐州车站时，恰好碰上应约去开封的李肃。于是，三人一同南行，到了上海，住在浙江路中国旅馆。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后来又移住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

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任军委书记，亲自抓兵运工作。王超接上关系回来，马上传达了上级的两点指示：第一、同意接受李肃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先参加兵运训练班学习。

第二天早上，三人坐在自己床上，给李肃举行了“入学式”（当时把入党叫入学）。由袁汉澄做介绍人。下午，“兵运训练班”开学，课堂仍是这间住房，学员也即是他们三个人。先后到训练班讲课的有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富春和军委兵运科的负责人朱瑞等同志。讲授的题目有：两个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动等等。除了听讲，他们还看了《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训练班结束那天，来了一位戴台湾式草帽、穿纺绸大衫的细高个儿，说：“中央决定，派你们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任务是争取该军到革命方面来。明天就走。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联系，接头的‘关系’就说是‘朱瑞叫来的’，到江西后，与上海联系的信上写‘交通大学袁凤渊收’”。

王超等离开上海到了南京。他们在下关码头正要过江，意外地遇上刘振亚，就决定在南京住一晚。

在住处，刘振亚把二十六路军最近的情况：诸如蒋介石的种种歧视，官兵的情绪不满，士兵生活的艰苦，以及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思想倾向，对蒋介石的愤慨，原西北军中、广大士兵，以至下级军官对刘伯坚同志的深刻印象等等，作了介绍。并说他